

推薦序 從印太海洋視野挑戰西方帝國——評《南方浪潮》

孔令偉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由歐美學界所主導的世界史敘事，往往將近世（early modern）乃至於現代（modern）國際社會的全球化浪潮，概括為線性發展的歷史進步論，即十五至十七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以及科學革命，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及工業革命，乃至十九世紀新帝國主義之崛起。這類以西方文明為核心的世界史論述，傾向以「民主」、「科學」、「資本主義」等起源於西歐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思想概念奉為衡量歷史發展之普世準繩。隨著五四運動以降近代中國知識人對「德先生」、「賽先生」的追求，上述以西歐文明價值為圭臬的現代主義史學，亦深刻影響華文世界對於全球化進程的歷史認識，影響甚鉅，直至今日。更具體的來說，想必不少臺灣讀者在中小學階段，曾反覆背誦歷史教科書中所謂科學革命、啟蒙運動以及工業革命相關的具體年代以及歷史人名，卻又對這些歷史名詞一知半解，唯獨對近代西方文明之強盛留下鮮明印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類文明的全球化係一漫長的歷史進程，其中分別活躍於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草原以及印度—太平洋（Indo-Pacific）海域的不同族群，

各自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換句話說，以晚近英美工業社會為主體的單一論述，是否真的能充分體現所謂「世界史」的多元面貌？對於史學界乃至一般讀者而言，無疑皆係值得反思之課題。而映入讀者眼簾的這本《南方浪潮：印、太平洋民族對抗帝國暴力、驅動現代史的革命年代》，正是從印太海洋視野挑戰歐洲帝國敘事的全球史新作。

本書作者蘇吉特·希瓦桑達蘭（Sujit Sivasundaram）為斯里蘭卡裔英國歷史學者，現任劍橋大學世界史教授。他的研究以及教學經驗豐富，曾任教於劍橋大學、倫敦政經學院，並曾擔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新加坡國立大學、澳洲雪梨大學等機構之訪問學者。他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帝國史以及印太海洋史，尤其涉及環境、科學、族群等相關歷史議題，並在相關領域著述甚豐。其代表作諸如二〇〇五年劍橋大學出版社發行之《自然與虔信帝國：一七九五至一八五〇年間在太平洋地區的科學與福音宣教》（*Nature and the Godly Empire: Science and Evangelical Mission in the Pacific, 1795-1850*）；以及二〇一三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發行之《孤島：英國、斯里蘭卡和印度洋殖民地的邊界》（*Islanded: Britain, Sri Lanka and the Bounds of an Indian Ocean Colony*）。綜觀其著作，蘇吉特的歷史視野多有獨到之處，他在把握宏觀世界史格局的同時，尤其擅於梳理印太海域地方社會之脈絡，進而從在地化視角挑戰過去的英帝國殖民史觀點。相較前兩本分別研究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地方社會的專著，本書《南方浪潮》在延續上述歷史寫作特色的同時，作者又在鉤稽相關具體個案的實證基礎上，更加深入淺出地梳理印太海域的多元地方脈絡。

本書的討論時段主要涵蓋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前期，尤其是一七九〇至一八四〇年代，而這也正是歐美史學界歷來所關注之「革命的年代」(Age of Revolution)。在上個世紀美國史學者帕爾默(Robert Roswell Palmer)以及英國史學者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等人的推動下，歐美史學界興起以民主革命、工業革命等西方歷史事件為出發研究世界史的浪潮。如霍布斯邦在其一九六二年出版之《革命的年代一七八九至一八四八》(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一書中，提出「雙元革命」(the dual revolution)的觀點，亦即政治與意識形態上的法國大革命以及經濟與科學技術上的工業革命，雖起源於西歐特定地區，卻通過殖民主義以及帝國主義擴張，從根本上形塑近代世界之脈動。歐美史學界過去圍繞「革命的年代」形成之學術討論，一方面固然對於推動世界史研究有長足的貢獻，另一方面卻又因時代限制難免落入西歐中心論式的論述，如帕爾默等人便曾斷言十九世紀亞洲、拉美以及非洲等地一切革命的緣起，歸因於十八世紀的西歐革命。而研究英帝國海外殖民史出身的蘇吉特之所以寫作《南方浪潮》的主旨之一，也正是為了從印太海域出發，翻轉前人習慣以西歐大陸為核心的世界史。

綜觀《南方浪潮》全書，蘇吉特這本力作主要有以下三點新意。第一，通過關注印太海域地方社會脈絡，本書突顯出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在全球史中所發揮之主體能動性。需要注意的是，所謂概念意義上的「南方世界」，並非嚴格以地理學上的赤道南北作為標準，而是由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形態進行劃分。至於本書所探討的南方世界，主要是印太海域諸多島嶼、海灣所形成的鬆散社

會，與立基於北半球歐亞大陸的西方帝國相對。以這個標準而言，斯里蘭卡在客觀地理位置上雖位於赤道以北，在文化概念上卻屬於南方世界。

長期以來，世界史之相關論著，往往以位於北半球的歐亞大陸為核心起點開展其歷史敘事，至於南方世界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則被視作相對被動。即便近年來不乏有全球史學者逐漸跳脫早期以歐洲、中國等農業定居社會作為人類文明象徵的刻板印象，轉向關注海洋、草原、沙漠等多元自然環境與跨域文化交流之關係，這些討論大部分仍以北半球的人類文明為出發。就臺灣近年翻譯出版的例子而言，韓森(Valerie Hansen)的《西元一千年：探險家連結世界，全球化於焉展開》(臺北：時報出版，二〇二二)以及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臺北：八旗文化，二〇一四)，這兩本力作分別探討十一世紀維京人美洲航行與中亞絲路人口移動之關聯，以及十三世紀蒙元治世下歐亞大陸東西之跨域交流，皆從歐亞大陸的視野出發，打破傳統國別史的藩籬，無疑為推動全球史研究之傑出典範；然而另一方面，這類全球史著作在南半球所留下的地域與文化空白，卻也讓讀者不禁好奇大洋洲究竟如何參與並帶動人類文明的全球化歷史進程，而這也正是《南方浪潮》原創意義之所在。

第二，《南方浪潮》的一大貢獻，在於通過重構被邊緣化的歷史記憶，以再現並詮釋歷史失語者的聲音，尤其關注南方世界的原住民、當地婦女，以及他們與歐洲下層殖民者之間的互動。過去傳統的歷史敘事，往往側重描繪作為政治核心的帝王將相；至於二十世紀下半葉所風起的文化思想史以及

社會經濟史，則將焦點投射至歐洲的啟蒙文人以及勞工階層，並進一步論述他們在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在這個脈絡下，過去學者在研究「革命的年代」時，雖通過研究新帝國主義擴張而促成世界史的討論，然而卻往往將非歐洲文明視為被動停滯、缺乏自新能力，從而被迫接受全球化、現代化的落後社會。為跳脫過去西歐中心論式的歷史敘事，蘇吉特並未將南方世界視作純粹被異化的他者，而是試圖從史料的吉光片羽中，批判性地發掘英帝國在殖民地所施行的暴力體制與知識分類，並闡釋當地原住民如何主動地介入、參與革命時代潮流下印太海域的關鍵歷史變化，同時辯證地反思所謂「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綜合對不同實際個案例的考察，蘇吉特所研究的印太族群背景十分多元，而筆者覺得其中第五章對澳洲依奧拉原住民婦女的討論，尤其代表意義，感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看。要言之，蘇吉特筆下的南方世界係一內部充滿異質的多元存在，而非與歐亞大陸截然對立的鐵板一塊。

第三，通過強調海洋媒介的流動性，本書對人類社會以及全球化進程的描述，採取一種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多元歷史敘事。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響，過去學界乃至一般大眾衡量人類文明的發展程度，經常以中央集權政府與官僚層級組織之複雜性作為標準。因此歐洲、中國一類定居型社會往往被視為高度發展文明，至於印太海域的原住民以及歐亞草原的游牧民則被視為所謂的原始社會。《南方浪潮》則從移動性（mobility）以及離散（diaspora）等觀點切入，在深刻分析印太海域複雜之社會文化背景的同時，亦突顯海洋族群自身的主體能動性，從而顛覆讀者對原住民社群單方面受

西方勢力衝擊的刻板影響。

最後，總結上述三點，筆者在此想提醒讀者，在品味本書所描繪的那些生動歷史情節時，切莫因陌生的異國人名、地名而感到氣餒，反倒不妨嘗試大膽思考，將書中面對大英帝國挑戰的印太海域族群，與清朝治下臺灣、蒙古、西藏以及新疆各地的地方社會進行思想比較，進而批判性地反思「帝國／邊疆」、「定居／移動」乃至「文明／野蠻」這類二元對立的權力敘事框架。如此一來，相信定能對帝國霸權以外的世界史，能有更加全面且深刻的認識。